

郭位教授清大 2016 年畢業典禮致詞 勉畢業生保持明亮的心

我的老師(一)

賀陳校長、各位師長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還有各位家長，恭喜你們優秀的子女從清華大學畢業。

我於 1972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核子工程系，很高興今天回來跟學弟學妹們做些報告。

畢業多年，我有一個體會，發覺儘管平常聽的大道理很多，但是很多小規則反而不見大家遵行。經賀陳校長同意，我趁著這個機會介紹我的老師。

我不知道，聽到這個題目時，你們有些什麼想法。在講到正題前，我想問在座的同學，畢業後準備讀研究所的請舉手，（在場大部分人都舉手），非常多；準備就業的請舉手，（比方才稍微少一點），也有不少，這個比例跟我當年畢業的時候差不多。

至於讀研究所的同學中，想出國的有多少？（少數人舉手），（比例上）好像沒有以前多。

講到出國留學，不由得想起兩三年前的往事。我在西安的晚會上，認識了一位農夫。農夫高興，因為他的兒子準備到波士頓讀書，大家恭喜他有傑出的孩子。農夫讓我印象深刻，則是因為他跟兒子的對話：「到美國讀書不是為了學位，也不是純粹為了學一技之長」，因為這些在中國大陸，用類似的講法，在台灣就可以得到。

他（告訴兒子）說，如果只求學位，可以留在中國大陸。出國留學應該學習人家做事的方法，了解美國的制度有什麼不同，有那些地方可以改進、採納，以便日後對中國社會作出貢獻？

這就讓我想起，台灣出國的人非常多，得到的國外學位、經驗應該也相當豐富，但是我們有沒有把西方健康的制度帶回台灣？這些表面的經驗經得起考驗嗎？存疑。

最近還聽到一個有關到波士頓的訪問團的故事，成員有博士、有碩士、有學士，也有一些高中畢業生。去過波士頓的人請舉手，（少數人舉手）。波士頓彎彎曲曲的道路像迷宮似有名的難找，這些人晚上出去之後很難順利回到旅館。不過，其中有個沒讀什麼書的人，到了市區之後，反倒輕鬆順利地回到旅館，並沒有迷失街頭。這代表什麼意思呢？

因為有學問的人，雖然英文好，語文、各種符號的認知都很好，但是學問把他們推到死角裡面，他們迷失在陌生的環境了。而這位沒有讀過多少書的人、原本就不怎麼懂他的本國文字，自己的國度並沒有迷失過他；把他擺在本國或是外國，找路從來都不是問題，原因是他思考路程的方式跟別人不一樣。

像找路一樣，許多事情處理得不盡如人意，並不是因為書讀得好不好、個人智慧夠不夠，而是有些人讀書讀進死巷子裏，沒辦法梳理，甚至於（沒辦法）像沒有讀過書的人看到的課本以外的境界。清華的同學們 IQ 高、EQ 高、書讀得好、待人處事也一流，畢業後在社會上的表現優秀。可是，能不能在學問之外發揮更大的功效？讀的書，有沒有可能讓我們不自覺地迷失而不自知？

果真是這樣子的話，那我們這些辛苦得到的學問，不見其利、反受其害。讀了書反而因為小事一樁而迷失於途，這個書讀的就有點可惜。

在座很多同學要讀研究所，有人出國進修，也有人準備就業。我趁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幾位我的老師，希望有助畢業生保持明亮的心。

其中一個，是清華的教授——蘇青森先生，我在清華最後一年，因為飲用水污染的緣故，想查出飲水裡面，砷、汞的含量到底有多少，這要用放射線中子活化分析的方式來偵測，……

在我出國之前，他跟我說，郭位你要記得，去外面讀書，老師最重要，找一個能開拓你心胸的指導教授，找一個能讓你學習永續學習的老師，倒不一定要找一個特別有名的學校。

我也要對你們說，如果你們修讀碩士、博士，記得找一個優秀的教授。蘇青森老師對我的教誨，讓我終身受用不盡。

由於他的關係，我到美國跟隨黃金來先生。他出身台南貴族，受日式教育，是台南一中的校友。黃先生先到上海交通大學讀了一年，再回到台灣大學機械系完成大學學位。他沒有受過政治迫害，留學美國，反專制、反戒嚴，所以被列於黑名單之內，得博士學位之後，不被准許返回台灣。

我在少年維特煩惱的那個年紀，也讀過台南一中，跟黃先生可以說是隔了很多年的校友。他做我的指導教授期間，我們每隔一天見面，每個周末都談七、八個小時，一半的時間談民主，一半的時間談學問。

台灣解嚴之後，黃老師終於可以隨自己的意志回到故鄉台灣，但是他決定不必回來了，「因為他不是政治人物，他認為該達到的目標已經達到了。」

黃先生十幾年去世，真的從來沒有再回來過。他教導我，治學要嚴謹，做為一個讀書人，要有崇高的理想。他不是政治人物、反對暴政，卻不想從這裡面得到任何私人的利益。

清華大學隔壁、交通大學的前任校長張俊彥先生也是台南人，台南一中畢業，剛巧也是我的校友前輩。

他的家庭受到嚴重的政治迫害，早早被列入黑名單，不准出國。這些灰暗的背景，不曾影響他的成長。他不尤人，也不自怨自艾，在國內得到學士、碩士和博士學位，是台灣半導體研究及產業研發最重要的人物之一。公元 2000 年，我們同時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。

無欲則剛，張先生說話直率，就事論事，或許偶有觀察不清的時候，他就像容錯（fault tolerance）的電子系統一般自我糾正，該執著的時候必會堅持原則。他跟黃金來的學習歷程處於兩個不同的極端——一個身處台灣、一個遠居美國；他們拋開個人恩怨，對真理執著、對學問真誠，把政治立場和學術科研分開，倒是相當一致，都是不可多得的老師。

接下來再跟各位介紹一位重要的清華老師。

我雖然學習理工科系，大三時選修了一門國際公法的課。教課的老師胡慶育先生，曾經出任中華民國駐阿根廷的大使，他在課堂上講了一個經歷過的不堪現實。

胡教授當過司法官訓練所的所長。有次他跟學員開會，一位年輕的司法官舉手批評：「你們這一輩貪污腐敗又專制，被從大陸趕到台灣，應該感到羞恥。」胡先生是個有良知的教授，覺得這位同學講的有道理，於是告誡班上同學：「你們這輩人要記取教訓，不可以貪污。」

可是過了幾年，有天打開報紙，發現當初罵他的那個司法官學員因為貪污被關了起來，他感慨地說：「我以為一代比一代強，沒想到一代不一定比一代強。」

這時候班上的同學沉默不語。胡先生告訴我們的故事已經是 40 多年前的往事。這些年來，他所自發的感觸大家是否覺得依舊歷歷如目？靜下心看看，我們的社會有進步嗎？為什麼一代代好像七月天的颱風一樣，不停地重蹈覆轍？

我相信一代比一代強，但是一代跟一代之間一定要學習我們的老師，從經驗中得到自己的知識，才可能帶動社會前進一步。一代比一代強，是一代比一代的智慧強、健康強、科技強、生活強；至於一代比一代的道德怎麼樣呢？我想各位同學要好好思考。

博士畢業後，我先到貝爾實驗室工作，再到美國大學任教，遇到一個主任。他年紀不輕，對於錢財處理得不太乾淨，用人有私心，沒有表現，卻領高薪，該退休的時候不退。他有很多問題，又對政治特別感興趣，偶有作弊，總是把學術處理得不清不楚。

這個主任也變成我的老師：我處理行政工作的時候，把他當一面鏡子來思考，他做的事情我絕對不能做。遇到疑惑的時候，我想像他將會如何處理，只要朝相反的方向做去就對了。

剛才進會場的時候，看到《聯合報》的王小姐對我出的書《高等教育怎麼辦》感興趣，她鍥而不捨、堅持到底，過去幾週，緊跟著我，甚至還跟到了香港。王小姐，你也是我的老師。如果我們能像王小姐這麼敬業的話，我相信社會會進步的。

說了幾個「我的老師」的故事，該是做結論的時候。

有一天，一個小朋友買瓷器，帶著杯子走進瓷器店裡，對著架子上的瓷器一個個地敲，賣瓷器的老闆問他：「小朋友，你在做什麼？」

小朋友回答：「我媽媽說，拿個杯子敲瓷器，如果聲音清脆的話，一定是好瓷器，可以買；如果聲音混濁的話，那就不是好瓷器，不值得買。」

老闆聽了，告訴小朋友：「你媽媽教的原則是對的，但是你手上拿著的不是好杯子，敲不出好東西。我給你一個好杯子，如果敲出好聲音，那一定是個好瓷器。」

這個杯子，就是我們的心。心不好，一定敲不到好瓷器。我們敲的那一堆瓷器，就是我們的朋友。如果可以從朋友中得到教訓，那麼這些朋友通通成了我們的老師。

孔子說過，走在路上的人都是我們的老師，我 44 年前從清華大學畢業，在社會上遇到過各式各樣的人，好人、壞人、善人、惡人，豪爽的、奸巧的，他們都是我的老師，都有可以學習的地方。好的，我們學習；不好的，我們應該當成一面鏡子、做為警惕。

今天晚餐時候，看到一張白紙，於是想起曾經有人把他撕成 4、50 片碎片，希望有誰能把碎片拼回來。好幾位智慧高的人，包括博士、碩士，在 5 分鐘、10 分鐘之內都沒有辦法把那些碎片拼成原樣。

可是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很快把碎紙拼好了。有人知道為什麼嗎？（學生答：他沒有想太多）；這個答案對了一半。其實，白紙的後面是一張清華地圖，小朋友不用複雜的心機，輕易、自然地察覺到，照著地圖拼，不就很容易拼出來了嗎？

問道於盲。如果心盲，則任何學位甚至諾貝爾獎都得救不了。

我提供這些經驗，與大家共勉、共享。對學習要執著，對學問不要被蒙蔽，對社會的現象應該就事論事，對問題務必觀察思考、不可盲從。我們需要回復自然，讓我們的心永遠保持明亮。

希望我介紹的這些老師，能給你們當作參考。祝福各位老師，並且再次恭喜學弟學妹從我的母校清華大學畢業。

註：香港城市大學校長、清華大學傑出校友郭位，應清大校長賀陳弘邀請，於 2016 年 6 月 5 日在清大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，《聯合報》記者蔡昕穎小姐即時報導。郭教授勉勵畢業生不要被學問推到死角，以上是他的演講全文，經由郭位整理定稿。